

论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四分法

颜 鹏 飞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1773—1836年)素来不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称道和器重。马克思则深刻地阐明了他在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指出,“詹姆斯·穆勒是李嘉图同时代人中创立学派来崇奉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最重要的人物”^①“是第一个系统地阐述李嘉图理论的人,虽然他的阐述只是一个相当抽象的轮廓。……从他这里也就开始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不过,穆勒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比李嘉图的观点前进了一步。”^②本文试图从另一个侧面剖析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家四分法,从而有助于从历史的角度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方法和结构的理论。

穆勒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部分的四分法。这是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三分法的修正,后者把交换列入了生产范围内。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实际上接受了穆勒的四分法。

《经济学纲要》是穆勒应用这种四分法的标本。它首先涉及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或内容以及研究任务。这本书的《导言》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范围和内容的划分》。穆勒明确指出:必须有人类

劳动的干预才能获得的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且认为,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关于生产和关于消费的研究,尤其是关于生产的研究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点。《导言》在最后还是提出了政治经济学对象所由规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任务,即研究调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法则或规律。

穆勒在第一章《生产》中研究了调节商品生产的规律或法则。他首先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无非是把自然界的某种物体放在一定位置上而已。生产劳动又可以区分为依赖工具的劳动和不依靠工具的劳动。而前者出现于当今的社会状态。这种工具就是预储资财,就是资本。穆勒还认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途径主要是靠资本的数量,其次靠劳动者的数量,此外借助于分工。他在章末总结的生产规律或法则是:一切国家的生产产业与该国的资本成比例,即随该国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并随其减少而减少。

由此可见,穆勒十分强调马克思称之为“普照之光”的资本的作用,强调了资本的生产力,同时又把资本范畴理想化和绝对化了。可以看出,穆勒的确是强调生产力的李嘉图的忠实门徒。

第二章《分配》考察了社会劳动出来的产品如何进行分配的规律或法则。穆勒认为,全部产品是在三个阶级(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进行分配的,剩下的问

题就是根据什么法则来决定分配的比例。分配给地主的地租量取决于资本投放于农业生产后所获得的农产品价值超过平均利润后的差额或余额。工人所得的工资取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供求关系。而利润则是年总生产物扣除地租和工资之后的余额，它与工资是互相依存的反比例关系。穆勒在章末还指出，资本的生产力乃是最终影响分配份额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见，穆勒在这里步李嘉图后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三大阶级对立的根源。他的地租学说庸俗因素最少，不仅阐述了地租的寄生性，以及与资本积累乃至社会整体利益相对立的品性。而且超越了李嘉图所规定的限度，在实际上提出了土地国有化的主张。然而，他的工资基金理论又庸俗化了李嘉图的工资理论。

第三章《交换》阐述了支配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穆勒一方面认为，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价值都是由劳动数量决定的，另一方面又强调资本即物化劳动或蓄积劳动也在创造价值。他以此来解释花费了等量劳动的新陈葡萄酒为什么产生价值差异的问题，试图解决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李嘉图理论体系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它的庸俗化和瓦解的历史进程的。

穆勒在最后一章《消费》中，提出了需求创造供给，当年总生产物在第二年被消费掉，以及消费（即需求，包括购买愿望和购买手段）与生产（即供给）相一致或平衡的消费规律或法则。该章共有十七节，其篇幅仅次于《交换》章。穆勒在这里所宣扬的形而上学的买卖平衡论，替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无危机论奠定了基础。

二

政治经济学四分法以及贯彻四分法原则的《政治学纲要》，不仅涉及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研究范围或内容，以及旨在探讨支配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法则的研究任

务，而且必然涉及到这四大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

穆勒在首先强调了人类劳动与四大研究对象的关系。认为，人类劳动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赖以成立的前提条件。他有一句名言：科学不在“垂手可得”之内，就是说，凡是不需要经过劳动而垂手可得之物，不是经济科学研究的对象；只有人类劳动参与其间的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才是经济科学研究的对象。

其次，他阐明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的地位。一方面，消费依赖于供给，另一方面，消费又产生供给。一方面，消费是目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只是手段，它们都服从消费这个目的，换而言之，物品是为消费而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点还是增加供给即发展生产，因为享乐欲望从而消费需求是无限的，而供给则是有限的，因而必须特别关注生产。所以，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分成两大部分，它实际上是关于生产和消费的研究，然而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即供给。这一点可以说是李嘉图学派的共同标志。同时还应该指出，穆勒在经济学说史首次强调消费在经济研究中的地位，把它同其它研究对象并列，这一点也是不应该抹煞的。

再其次，穆勒严格地确定和安排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递进序列。他把生产置于研究对象之首，而分配和交换在他看来则构成中间性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课题，而消费是位于交换之后的最后的研究对象。并且，他还多次提出“方便”这个理由，轻率地论证这种序列安排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毋庸置疑，这种序列固然是一种联系，并且是适用于好几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合理的抽象，然而从根本上讲仍然是一种肤浅的外在形式上的联系。其错误根源在于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把一定历史阶段上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合理化绝对化了。因此不能

从根本上把一般抽象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同特殊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区别开来。

然而，进一步的考察表明，穆勒的分析并非仅仅只停留在这种肤浅的联系之上。他毕竟觉察到，这四大研究对象的关系并不是平起平坐的并列关系。因此，他强调消费，更强调和突出了生产的地位和作用，并且还阐述了生产和消费之间彼此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关系。他并非完全把研究对象绝对化永恒化，因此往往不自觉地资本关系渗透其中。所以，他处处强调资本的生产力及其决定作用，并在实际上认为消费关系中也存在着资本关系，指出，生产中所消费的东西就是资本，并且通过消费才成为资本；还认为，资本一词包括资本和劳动二者，资本家是产品和劳动的所有者，就是说，分配关系也渗透着资本关系。等等。此外穆勒在实际上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至少是其中部分环节）置于直接生产过程之中和非直接生产过程即社会生产总过程之中，各自予以考察。他一方面在《生产》章中提出，资本家是生产二要素即购买的劳动和预储资财（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之中的分配；另一方面又在《分配》章中阐述了地租、工资和利润，这是属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分配；后一种类型的分配是前一种类型分配的必然结果，因此，穆勒认为，资本家理所当然地得到全部产品。《消费》章则区分了二种消费。一种是属于直接生产过程的生产消费，它本身就是一种生产或生产手段，例如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原材料的消耗以及机器设备的损耗，但是，前二者是全部性消费，后者是局部性消费。另一种以消费为目的的消费是属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非生产消费。马克思在这里指出穆勒下述看法是错误和片面的：“只有使工人阶级永久化所必需的，也就是为了使资本能消费劳动力所实际必要的那部分工人个人消费，才是生产消费。除此以外，工人为了自己享受而消费的一切都是

非生产消费”，而同意了马尔萨斯关于工人个人消费对于自己是非生产的而对于资本家是生产性消费的观点的③。

三

政治经济学四分法以及贯彻这一原则的《经济学纲要》，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到政治经济学结构的问题。如何把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成果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科学的叙述或阐述，从而逻辑地复制出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方式，这就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

穆勒的《经济学纲要》正是依次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次序排列的一种四分法结构。这种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形而上学地把各种经济范畴机械地塞入生产、分配、交换或者消费；然而在开始着手具体考察时，又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继起的具体的复杂的范畴都作为前提，予以假定。穆勒在头二章里就提出了人口、阶级、国家、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再生产、地租、工资、利润、生产成本诸多复杂的范畴。这一点却是与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结构大同小异，如出一辙。李嘉图在这本书的头六章甚至在前二章《论价值》《论地租》中，已经把各种具体范畴都全部抖落出来了。这是同从抽象上开到具体的科学的结构法则大相径庭的。

然而，穆勒的四分法结构优于李嘉图理论体系的地方，在于它表现了一种外在形式上的逻辑一贯性，因而具有系统性以及通俗性和教科书性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结构却显得臃肿、松散和杂乱，象一本论文集子，因而比四分法结构大为逊色。这是就外在结构的特点而言。由于穆勒刻意追求形式上的逻辑一贯性，却抛弃了李嘉图体系内在的优点。这又是四分法结构不如李嘉图体系的地方。李嘉图体系的最大优点就是首尾一贯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出发点和内在机制——价值规律。他在第一章

《论价值》里就明确地论证了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用以验证“其余的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资本主义〕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④穆勒却为了形式而牺牲内容。他迟迟在第三章《交换》第三节里才提出货物相互交换的数量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资本(即蓄积劳动或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的庸俗价值观,企图以此来解决价值规律与利润存在的矛盾。但是,“他所加工的原料已不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经老师提炼后变成的新的理论形式了。一部分是新理论的反对者们理论上的不同意见,一部分是这种理论同现实的往往是奇特的关系,促使他去进行把不同意见驳倒,把这种关系解释掉的尝试。在进行这种尝试时,他自己也陷入了矛盾,并且以他想解决这些矛盾的尝试表明,他教条式地维护的理论正在开始解体。”⑤可见,穆勒的四分法结构实质上是外在形式的逻辑一贯性和内在联系的非一贯性的混合体。

综上所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四分法在经济学说史上开创了一个先例。其中也不乏合理的因素。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乐于接受,甚至认为他是“正统派经济学的一个模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四分法的框架基于它的抽象一般和形而上学的品性,易于随心所欲地塞入各种各样的经济理论。⑥

四

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四分法以及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象、方法和结构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部分则集中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上述理论。

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首先是物质生产”而且是包含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在内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物质生产即社会生产方式。⑦根据一般和特殊的哲学原理,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对象区分为二类:物质生产一般和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特殊的物质生产,并且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物质生产一般只要真正把各个时代的生产的共同点提出来,固然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但是“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因此要下决心从一般上升到个别,“不致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马克思因此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任何经济范畴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⑧穆勒虽然也强调资本,然而从总体上看,穆勒和其它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通病就是混淆了这两种类型的对象之间的差别,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绝对的自然的生产形式。

马克思还把政治经济对象看成是一个系统,完整地辩证地阐述了诸对象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穆勒父子和其它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鼓吹的那种肤浅的形而上学的联系,遭到了马克思无情的抨击。《导言》在《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的标题下,首先论证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它们既有同一性:生产与消费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直接等同的,由此出发区分了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每一方都以另一方为手段或媒介;并且它们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它们又有差异和矛盾:生产是起决定性的因素,而消费只是包括在生产过程之中的一个内在因素。马克思还阐述了生产与分配的辩证关系。指出,分配就其对象和形式而言,都是生产的产物;并且区分了生产工具和劳动成员的分配,以及赖以进行的产品分配。马克思也阐述了生产与交换的关系。指出,交换可划分为属于直接生产过程的交换,以及属于生产过程之外的为消费而进行的交换;前者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后者则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

思最后得出结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而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后者对生产也产生巨大影响。

由此可见，马克思吸收了穆勒四分法的某些合理因素。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导言》最初在正文中采用的提法是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以后在包含《导言》的“M”笔记本的封面上才采用更确切的提法——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与此同时，《导言》还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上种种“时髦的做法”和“全部智慧”，从而创立了马克思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理论。^⑨

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理论又是与政治经济学方法和结构的理论紧密相关的。他在《导言》第三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明确提出，这种方法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后一种方法又是叙述的方法），以及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辩证方法，并由此制定了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结构的方案和原则。马克思首先确定了具体的研究对象，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研究的主体（无论在现实中或是在头脑中）就是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一系列经济范畴只是它各个侧面的抽象反映，“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⑩他还强调必须把握资本概念或范畴在诸经济范畴中的中心地位，因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也是决定其它一切关系的作用和地位的“普照之光”，这对于确定各经济范畴的位置、序列或联系具有重要意义^⑪此外，马克思还强调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指出，在一定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进程”，这

对于确定逻辑结构的起点和终点，验证逻辑次序或结构具有重要意义。^⑫只有这样，才能使反映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各个经济范畴各得其所，井然有序地从简单、抽象依次上升到复杂、具体，从而科学地复制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结构。如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作过程中，提出了《资本论》结构的雏形——六册结构。^⑬马克思的《资本论》结构是穆勒四分法结构所无法比拟的。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在詹姆斯·穆勒那里，有一些不适当的章节划分：《论生产》、《论分配》、《论交换》、《论消费》，”以及“形式上的逻辑一贯性”。^⑭可见，穆勒的四分法结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外在的乃至歪曲的反映。

总而言之，作为李嘉图第一批激进的信徒的穆勒，他的政治经济学四分法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其政治经济学对象、方法和结构的理论。这部分理论有许多庸俗因素，但也有一些合理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穆勒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为马克思制定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对象、方法和结构的理论，提供了颇有启迪的思想材料。

注释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58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②④⑤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87—88页；Ⅰ，182页；Ⅱ，87页；Ⅲ，92、87页。

③ 《资本论》第1卷62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⑥ 河上肇：《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第265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⑦⑧⑨⑩⑪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8页；25、22页；22，23页；40页；45、44页；40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531页。